



高金智库要报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中国金融研究院

总 073 期
2025 年 4 月

2024 年全球宏观政策影响应对及经验借鉴

【内容提要】 2024 年，大部分主要央行陆续进入降息周期，全球宏观周期的调整使得我国面临的外部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本文尝试对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地 2024 年出台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动态进行跟踪观察，并落脚到我国实践，在厘清外溢影响应对思路的同时，立足国际经验，提炼

于我国有借鉴意义的政策制定思路。

一、2024 年海外宏观政策分化削弱了降息周期对我的利好影响

2024 年主要经济体陆续进入降息周期，全球资金面紧张态势逐步趋于缓解。然而，主要经济体财政政策因面临债务整顿压力而趋于收缩，下半年通胀走势顽固掣肘货币政策的推进节奏和实施力度，这些趋势也削弱了宏观调控政策在改善总需求方面的效果和作用。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分化明显，日本在全球央行降息潮下逆势加息，美国则在全球财政收缩背景下扩大支出，宏观调控周期错位也放大了市场震荡。

从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看，**货币政策方面**，若以实现 2%通胀目标的法定职能作为评判依据，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都难言有效——不仅年末通胀均高于 2%，许多央行在开启降息周期时通胀也并未回落至目标值以下。该趋势反映了主要经济体在 2024 年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因素的考虑权重较物价因素更高。从促进增长的角度看，主要经济体在 2024 年均出现温和复苏态势，尚无经济体出现明显的硬着陆或实质衰退的状况。主要经济体的降息决策也改善了国内信贷环境，2024 年各经济体的信贷余额增速上升或降幅收窄。**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整固和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是主要

经济体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从实际进展看，美国在财政整固方面的进展不达预期，赤字率和债务率都在持续攀升，债务上限谈判仍将在 2025 年延续。相较而言，非美经济体在削减赤字和债务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欧元区、日本的财政赤字规模较上年度均明显收窄、债务率持续下行。英国和新加坡 2024 年的财政收支则由赤字转为盈余，英国的偿债支出更是逐年减少。此外，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在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创造就业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银行监管方面**，美欧在银行业危机后监管明显趋严，2024 年两地银行体系压力明显缓解，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流动性等方面的合规状况明显改善，但资产质量风险苗头初现。

虽然全球降息周期有助于缓和我国面临的外部形势，为我国实施更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打开有利的时间窗口，但海外宏观调控中收紧倾向也将放大对我国资产价格和跨境资金的外溢冲击，具体反映在以下方面：**首先**，美联储降息的不确定预期。美联储虽然不是本轮全球宏观政策周期的引领者，降息力度也远低于预期，但其议息动态本身仍然是我国外溢影响的重要来源。不管是上半年降息预期的推迟，还是 9 月降息后再度转鹰，都引发市场预期反复逆转，对我国产生较为明显的外溢效应，尤其体现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上。**其次**，日本的加息周期与其他主要经济体降息周期的错位，导致全球套息交易逻辑逆转，引发跨境资金逆向流动。

我国和日本的利率相对较低，资产替代效应更强，日本银行年中二度加息后，境外对人民币债券的持有意愿明显减弱，债券通项下净流入规模锐减。**最后**，欧洲方面对财政纪律的强调也将对冲降息周期对各自国内经济的提振作用，对我国的外贸形势和跨境资金流动格局带来相应冲击。

二、2024 年海外宏观经济与金融监管政策制定思路的经验借鉴

（一）海外宏观调控重心从熨平经济周期转向系统管理不确定风险，强调政府在构建生产型社会关系中的引导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的本质是管理和降低不确定性，使经济重回稳定增长的轨道。譬如 2%的通胀目标就是为了锚定市场预期，帮助企业和居民作出更理性的经济决策。而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全球局势冲突分化等背景下，经济增长轨道和通胀形成路径等也在发生变化或更趋复杂。这对宏观经济决策也带来新的启示，一方面，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宏观环境下，如何在加强短期灵活度的同时，兼顾长期引导效应，是宏观调控部门需要理清其职能的重要出发点。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仅由各个宏观调控部门围绕某个量化目标进行决策，无助于在整体上降低宏观不确定性。宏观经济领域的跨部门协同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化解和应对新趋势新变化对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影响。由各司其职的政策制定模式，向由经济治国方略引领的系统化政策制定思路转变，

不仅有助于提升宏观政策的整体效能，也能够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和灵活度，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宏观形势。

反映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看到，2024年经济考量相较物价因素在主要经济体货币决策中的权重明显上升。譬如，欧元区增长乏力驱动欧央行在年中通胀尚未降至2%目标以下就启动降息。美联储9月降息也主要由劳动力市场疲软推动，尽管当时核心PCE同比也未回落至2%的目标值。美联储2024年还采取了拓宽利率走廊宽度的技术调整，更好地化解短期市场波动对政策可信度的冲击，聚焦更长期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若是以稳定物价为评判依据，所有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都难言有效；但若是从促进增长的角度看，主要经济体在2024年均出现了温和复苏态势，未出现硬着陆或实质衰退的状况。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系统论（降低整体不确定性的角度看）的框架下，通胀预期的锚定比探讨实现某个政策目标点位更有意义，可根据产业格局的调整和推动通胀的趋势因素定期审查通胀目标^①。也有专家指出，美西方依赖数据的货币决策模式也面临滞后性和局限性^②，特别是美国在2024年重要经济数据经历多次重要修正，导致市场预期频繁逆转，反而加剧了宏观不确定性。

^① L. Reichlin, J. Zettelmeye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must adapt to an environment of inflation volatility”, Bruegel, 2024-6-12, <https://www.bruegel.org/analysis/european-central-bank-must-adapt-environment-inflation-volatility>

^② M. Demertzis, “Macroeconomic Policy Frameworks in the EU: in need of renewal”, Bruegel, 2024-1-16, <https://www.bruegel.org/opinion-piece/macroeconomic-policy-frameworks-eu-need-renewal>

财政政策也反映了类似的思路，虽然非美经济体在 2024 年都普遍采取稳健审慎的财政政策，以降低政府债务扩张可能导致的宏观经济风险，但政府并不局限于赤字缩减或是财政紧缩本身，而是更重视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从思路上看，这些政府或是通过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更多向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倾斜（如欧洲），以兼顾经济发展（如科技发展、低碳转型等）和金融安全的目标；或是将经济稳健作为财政稳健的前提（如日本），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消化债务，实现财政整顿的目标。此外，不管是拜登政府，还是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颁布的政策，都指向了西方社会近年来在经济发展范式上的调整，即将生产置于经济生活的核心，强调政府在构建生产型社会关系中的引导作用，从微观层面调动各个地区和所有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相关发展范式既需要更有效的宏观政策协同，通盘考虑对价格、生产力和产业发展的综合影响和引导作用；也需要结合“生产主义”与“平均主义”之长，建立经济内生动能，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2024 年，主要经济体出台的宏观政策很好地反映了上述趋势。首先，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均在重要的产业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支出和制度安排，以抵消货币政策难以充分提振总需求方面的不足。譬如，日本近两年的政府预算重点关注数字/半导体和绿色转型，以及少子化等领域的支出^①。美

^① MOF, “Highlights of the FY2024 Draft Budget”, “Highlights of the FY2025 Draft Budget”, <https://www.mof.go.jp/english/policy/budget/budget/fy2024/01.pdf>;

国财政部 2024 年在《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框架下持续完善包括直接支付、可转让信贷交付机制等在内的配套政策，解决“有钱花不出”的问题；并通过加强特定领域的“学徒制”教育和就业培训援助，加强美国劳动力与岗位、技能的适配度，促进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其次，主要经济体较为重视重点产业领域的跨部门体制安排。譬如，英国工党上台后，新政府通过设立产业战略委员会，引导全国范围内的投资和产业发展；美国商务部在 2024 年围绕 AI 安全发展，先后设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联盟、国家安全人工智能风险测试工作组等相关协调组织，以建立完善的行业规范和创新生态。再次，主要经济体也在考虑通过发挥政策的杠杆效用、加强公私合作，以解决财政资金支持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譬如，英国年初通过设立科技创新部门和全球奖项，鼓励企业展开以创新为驱动的投资生产活动。下半年，新政府通过设立国家财富基金，用于港口升级、绿色产业等领域的投资，带动私人部门投资增长。日本 2024 年专门发布“日本财政再生计划”“统合创新战略 2024”“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2024”等重要规划^①，旨在加强宏观政策和公私部门协同，在促进财政健全化的同时，构建促进研发和成果转化、

<https://www.mof.go.jp/english/policy/budget/budget/fy2025/01.pdf>.

^① Cabinet of Japan, “Basic Policy on Economic and Fiscal Management and Reform 2024”, 2024-6, https://www5.cao.go.jp/keizai-shimon/kaigi/cabinet/honebuto/2024/2024_basicpolicies_en.pdf; “Integrated Innovation Strategy 2024”, 2024-6, https://www8.cao.go.jp/cstp/tougosenryaku/togo2024_honbun_eiyaku.pd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Program 2024”, 2024-6,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chitekizaisan2024/pdf/siryou2_e.pdf

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商业生态，扭转生产率长期低迷的不利局势。

（二）美欧银行监管延续危机后的趋严态势但各有侧重

早在 08 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在巴塞尔最新银行监管框架下，积极展开审慎监管和危机应对等方面的制度探索，围绕全球重要系统银行（G-SIBs）展开的监管规则体系建设为重中之重。虽然这些监管原则并不具法律强制效力，但作为软法正推动各国银行监管部门积极探索国内相关监管改革。2024 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修订版^①，新增对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公司治理、新兴风险、机构运营复原力等方面的监管要求，绝大部分内容反映了欧美银行业风险事件的直接影响。

美欧作为国际银行监管的重要博弈方和 2023 年全球银行业危机的重创地，2024 年发布的银行监管政策既反映了近年来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改革要求，也有针对各自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风险领域和薄弱环节展开的制度探索。从监管特征看，欧洲银行监管脉络相较美国更系统化，与国际银行监管规则的协同度较强，风险分类和技术规则的颗粒度较细。背后反映了欧洲银行监管局在制定区域银行监管政策时，需要统一的规制作为不同独立辖区制定和执行相关规则的准绳和方法论，对规则明晰度的需求高于灵活度。而美国监管当

^① BCBS,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2024-4-25, <https://www.bis.org/bcbs/publ/d573.htm>

局在推动国际银行监管原则本地化时，更侧重对本国银行业发展的实际考量，强调根据银行实际状况（如资产规模等）实施分级监管，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灵活度。以上差异也使得美国在落实国际规则方面的进度慢于欧洲，监管力度也相对较弱。从监管思路看，美国的银行监管以机构监管为主、功能监管为辅，强调监管的灵活度和市场机制的作用。2024年出台的政策聚焦特定机构的运营和风险管理，机构监管特征更明显。而欧洲的银行监管更加关注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并重。2024年出台的政策亦反映了对同类特征的业务或风险实施统筹监管的思路，注重跨机构、跨市场协调，相较美国功能监管特点更突出。

欧洲银行监管的系统化和颗粒度特征，以及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并重的思路，也反映在资本监管、风险管理和透明度建设等方面。从2024年出台的政策看，欧洲的资本监管注重监管参数和工具分类的规范度，对特定的资产类型（如零售贷款、企业贷款等）根据风险特征设置不同的权重，在资本工具的认定上较美国更灵活。欧洲的风险管理则是在国际通行框架下，针对每类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专门出台颗粒度极细的技术规范，更好地指引各国银行监管实践与国际通行规则对齐。但相关规则也导致欧洲银行业面临较美国及其他非欧同业更严的监管环境，削弱其国际竞争力。故欧盟在2024年也综合考虑了本地区银行的

发展诉求，对风险管理框架进行了适当调整，譬如推迟交易账簿基本审查（FRTB）内部模型规则实施日期等方面。欧洲审慎监管的精细化也反映在透明度和数据管理规则方面。2024年，欧盟专门设立了银行报告委员会，通过开发共同数据词典，以整合和协调欧盟在银行业统计、监管和处置等领域的数据汇报规则；并专门设立数据枢纽（Data Hub），对所有受监管金融机构采取集中化的审慎披露措施，并允许公众下载查看。

美国银行监管的灵活度和市场化特征，以及机构监管主导倾向也体现在风险监管框架和信息管理规则的升级方面。2024年，美国监管当局延续了银行业危机后的监管趋严态势，尤为关注系统金融风险的化解和防范，但不同于欧洲较为重视在主要风险领域与国际监管规则对齐，美国对风险监管框架的调整具有较强的危机驱动特征，对可能引发系统风险的重要环节和主体加强监管要求，在常态化监管方面重视对风险传导路径的阻断。具体来看，2024年美国银行监管当局全年出台两份银行有序处置规划，着重加强对大型银行的清算规划要求和监管指引。由于美国倾向于采用市场化方式处置问题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在2024年还重点关注银行并购和控制权变更等领域重要法规的修订，以规避事后重组可能引发的不利影响；并通过修订薪酬制度、强化对

工业信贷类金融机构内部风险隔离要求^①等措施，加强对金融系统风险的事前防范。与欧洲类似，美国在 2024 年也出台与透明度和信息管理相关的规则，但更强调对未保存款数据的披露，以及监管机构之间数据收集规则的协同等等。

除审慎监管外，欧美在 2024 年还重点加强了对新兴风险的监管，欧洲相较于美国在监管框架和措施方面更加全面和细化。针对可持续金融领域，欧洲监管当局在 2024 年出台的相关政策不仅涉及银行审慎监管范畴，即加强 ESG 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也对所有金融机构出台系统化的可持续金融披露规则，具体涉及“可持续”和“转型”的产品分类、披露方式和市场测试等内容。而美国不仅在 2024 年没有出台任何与 ESG 或可持续领域相关的银行监管措施，甚至还考虑取消气候压力测试的要求。针对数字金融领域，欧洲针对加密货币，特别是主要加密资产发行人的行为规范提出全面审慎监管框架，并加强行业发展中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风险管理要求。美国方面，Synapse Financial 倒闭事件^②虽然引发监管当局对 Fintech 公司的存款安全问题高度关注，

^① FDIC 发布加强工业银行和工业贷款公司母公司监管框架的拟议通知，旨在修订工业信贷机构母公司的监管范围和要求，并确保子公司独立于母公司运行的能力，包括壳公司和（为母公司零售采购提供资金的）专属金融机构，以及对相关机构展业所在社区的融资便利化和需求支持能力等。

^② Synapse Financial 作为 SaaS 类型的 Fintech 公司，通过与银行合作为 Fintech 公司提供支票账户、借记卡服务等产品。2023 年，Synapse 与其合作银行 Evolve 之间的纠纷导致其在 2024 年 4 月申请破产保护，由于 Synapse 不在 FDIC 保险范围内，倒闭事件也导致了大量储户存款损失。部分依赖 Synapse 服务的信贷类 Fintech 企业也被迫关停业务，整个 Fintech 行业也因此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但 FDIC 在 2024 年仅对与 Fintech 公司合作的银行提出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如信息披露、存款保险簿记规则、经纪存款审慎监管等），对 Fintech 机构或业务本身并没有专门的监管措施。

三、政策建议

（一）客观看待和应对海外宏观周期对我国的外溢影响

2024 年，我国宏观调控虽然体现出明显的扩张倾向，但实际力度仍然有限。一方面，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在 9 月紧跟美联储降息降准和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后，由于美联储后续降息预期逆转，并没有跟进更多的宏观调控措施。另一方面，横向对比来看，我国 2024 年虽然持续降准降息，但实际利率相较主要经济体仍处于较高水平；同年，财政支出增速虽然超过收入增速，但支出增幅远小于美、欧、新等发达经济体，也弱于 2023 年我国的支出增幅。从背后原因看，除海外宏观政策周期的不确定预期外，人民币汇率和债券收益率的持续下行也限制了我国宏观调控的实施空间。美联储年底鹰派降息推升美元走强，导致人民币汇率在 12 月末降至 2024 年最低水平，至 2025 年初始终面临压力。此外，我国主要债券收益率从去年初开始持续下行，虽然央行在下半年启动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但也没有扭转债券收益率的下行走势，我国金融系统资产端压力持续上升。

然而，仅靠美联储降息来争取我国的宏观调控窗口的思

路将使我国面临较为被动的局面。面对海外宏观周期的外溢冲击，不应因噎废食，而应着眼长远、练好内功。首先，宏观调控政策应从恢复经济的内生和再生能力入手，从根本上扭转市场信心不足和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行走势，而非疲于应对汇率超调或维持利差等目标。其次，可考虑通过完善实体经济的外汇套保和风险对冲配套体系建设、加强宏观审慎调控的精准度、提高债券收益率曲线和市场建设、增强银行体系的中间业务和非息经营能力等措施，从根本上化解汇率和收益率下行对我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冲击，也为货币政策专注于国内发展目标创造有利条件。从欧元区的经验可以看到，虽然其下半年降息幅度和频次远超过美英等经济体，但其全年债券收益率走势都较为平稳，银行体系净息差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虽然欧元兑美元贬值幅度略高于其他经济体，但其全年经济走势明显好于 2023 年，也好于降息幅度更小、频率更低的英国，金融项下资金反而呈现明显的净流入，而后者的净流出趋势更明显。

（二）有的放矢地借鉴吸取海外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

首先，关注宏观调控政策在实际降低不确定方面的职能优化与协同作用。在当前国内外不确定加剧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也需要审视量化目标本身的合理与否，重点关注货币和财政政策在降低宏观不确定性、促进需求提振和重点产业领域发展的实际成效，并根据阶段反馈及时优化和调整

相关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应认识到量化目标的设定作为货币当局管理不确定风险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 and 居民部门锚定预期、形成理性的微观决策，进而推动经济回归稳健增长的轨道。对此，相较于量化目标本身，更需关注决策透明度、政策可预测性和连贯度的提升，但也同时需要根据产业格局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因素等，定期审核长期量化目标本身合理与否，避免经济实际发展需求和目标的脱节。此外，针对货币传导不畅、资金紧张和金融分化等问题，应加大短期工具创新，熨平短期波动对经济活动和市场预期的冲击。同时，也可考虑以目标区间代替点位，或是扩大目标区间宽度等措施，避免对短期市场波动的过度关注导致对长期目标的失焦。**财政政策方面**，西方国家致力于实现以生产力驱动的增长化解债务压力，兼顾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对我国而言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其也与旨在提振总需求的货币政策形成政策合力。具体来看，应加强在重点领域的财政支出，或是充分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如设立产业基金、加强公私合作、完善知产保护制度、鼓励各级政府设立创新奖项等模式，充分调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产、投资和创新的积极性。

其次，虽然我国在产业政策方面更有经验，但西方经济体在政策灵活度和精细度，以及政策协同部署等方面的做法，对我国有相应的启示意义，尤其体现在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等方面。比较值得借鉴的经验包括美国对劳动力素质的重视，以及日本对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关注，这些都为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了重要经验。**在劳动力制度建设方面，**应考虑消除各年龄、各群体的就业歧视和限制政策，配合当前重要的产业发展趋势，加快完善跨领域职业/再就业培训和教育体系建设，从扩大劳动力供给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增强经济增长动能。**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可参考日本将研发视为资产形成而非支出的理念，引导企业从中长期进行创新投资；提高专利认定的技术门槛、合理运用各类政策杠杆，引导产学研界展开真正促进生产力突破、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创新活动；就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可能引发的知识产权争议进行前瞻制度探索；积极推进政学产协同创新和国际规则制定等工作；构建研发人才培养、引进的生态系统，重点关注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方面的促进和保障政策指引。

最后，西方社会对产业政策的重视也为我国主动寻求国际规则对话和协商打开空间。我国应在立足事实的前提下，加大在倾销标准界定、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等诸多规则细节上的对话与协同，并在多边框架下深化相关讨论、形成制度成果。

（三）借鉴国际经验持续提升我国银行监管的精细度

首先是中小银行风险化解方面。近年来，我国在处置中

小银行风险方面的思路以兼并重组为主。然而，在不良资产核销后，由于这些银行的资金筹措和风控能力没有得到实质解决，导致合并不仅没有解决本质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大的“问题银行”。巴塞尔委员会今年发布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将原先作为附加规则的合并监管、公司治理、市场风险管理等升级至常规监管规则，这些领域也将是我国化解、处置中小银行风险的重要思路，也是落实国际最新监管要求的切实抓手。2024年，美国专门针对银行合并出台指引，旨在确保合并后的机构在满足社区融资需求方面的能力不弱于合并前各家机构之和，风险则小于合并前各家机构风险之和。具体措施包括对合并后的机构设置专门的压力测试及其他监管要求；加强合并后机构的公司治理要求；定期审查贷款数据等，相关政策实践对我国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此外，瑞士当局对瑞信实施的“稳定后重组”策略也对我国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其首先要求银行通过内部资源进行自救，随后由瑞银在兼并瑞信后持续推进集团内重组。对我国的监管启示是，可考虑对中小银行加强在损失吸收能力（LAC）债务工具方面的储备要求，兼并重组后需对新机构全面加强业务模式的可持续性、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监管指导和合规要求，从长期确保合并机构的稳健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新兴风险管理思路方面。《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将气候风险和数字金融风险纳入监管框架，要求银行建

立全面的风险管理政策，欧美 2024 年的相关监管实践对我国具有启示意义。譬如，**气候风险方面**，我国目前正在探索将气候风险纳入银行压力测试，银行业在 ESG 和可持续信息披露方面的实践远早于并超过其他金融机构。但从披露质量来看，不同银行披露的内容和格式存在差异，定量数据披露相对较少、与国际实践的可比性较弱。欧洲金融监管当局在 2024 年对所有金融机构出台了系统化的可持续金融披露规则，我国对此可与欧洲监管当局率先探索在相关规则对接方面的监管实践，加强披露质量和规范程度，并逐步探索由银行到所有金融机构的披露要求，在促进全行业监管规则趋同的背景下，实现各类市场与产品的联动，并进而为碳金融市场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数字金融风险方面**，当前我国境内禁止加密资产交易，与银行相关的监管主要涉及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面临的信息披露、存款安排及其他风险管理要求，与美国较为类似。但即便如此，我国与美欧对银行涉及金融科技合作的信息披露要求也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监管对银行披露格式、规范度和频率的要求较为宽松，对信用风险的披露较为简单，对市场风险的披露规范几乎空白，对数据隐私和安全保护措施披露要求相对原则性。而欧美要求较为严格，规定银行详细披露风险评估模型假设、参数选择、验证情况、创新活动潜在风险，以及数据加密技术、数据泄露应急处理措施等，相关经验也可逐步、适当吸收到我国的监管实践中。

最后是数据规则制定方面。美欧在 2024 年都加强了银行部门的数据管理要求，并通过制定数据标准或出台监管信息互换指南，加强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共享、提升监管信息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相关思路对我国加强银行透明度建设、细化审慎监管颗粒度、增强监管协同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目前，我国各监管部门、行业、央地和各地均面临“信息孤岛”的局面，可考虑通过跨部门和央地统筹，就数据披露、接口标准等建立国家层面明确、统一的规范，各部门、各地监管机构则可通过单独制定信息收集的规章制度、完善自身信息系统建设等措施，以落实相关规范共识。在实践中，还可考虑通过数据脱敏等技术措施确保数据安全。数据集中共享，既有助于银行信息的审慎披露和公众监督，也有助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有效应用。目前通用大模型并不适合于在信用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专业领域的应用，需要训练垂类的专业模型。但单一机构的数据量，尤其是中小银行的数据量不足以训练一个高质量的垂类模型。如果能将银行集中共享的数据用于垂类专业模型训练，不仅能确保模型质量，也可避免各家中小银行重复训练的成本浪费。

本期指导：刘晓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

本期执笔：杨悦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智库青年研究员

文字编辑：程冠男，高金智库编辑部

责任编辑：汪 洋，高金智库研究部